

对新轴心时代的展望和文明对话的戒律

——以思想史的视角理解我们时代的挑战

陈越光

挑战的本质

我们时代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可以从根本上归纳为两大冲突：土地不断沙化、PM2.5、雾霾、水污染、温室效应、动植物的物种濒绝、能源危机等，都是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人类自身持续生成的危机，可以归结于人与自然的冲突。

另外一个当今最严峻的暴力冲突，就是不可能取胜的所谓全面反恐战争，ISIS 的暴行、各式各样的“查理事件”……这些地区失衡、贫富差别、族群矛盾、极端恐怖暴力事件凸现的伊斯兰与西方文明冲突的背后，都可以归纳为人类自身（观念）的冲突。

能回到轴心时代去吸取智慧和力量吗？

面对这样的挑战和危机，我们能像两千年来所做的那样，回到轴心时代去吸取智慧和力量吗？

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1949年发表了《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文，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轴心文明理论。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大约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个五六百年的时间段里，人类进入轴心时代，人类到今天为止的主要宗教和主要的哲学观念都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这是我们文明的源头。而且他进一

步提出“人类一直是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是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两千年来，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新的发展都是我们回到文明的源头去吸取了力量，面对这一次挑战，我们能再一次从轴心期潜力中获得复兴的力量吗？

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有过一个著名的论述：谁将继承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他的出发点是认为西方文明开始衰落了，他的结论是唯一有可能的是中国文明，他在文章中这样说：“如果中国人认识不到自己的使命，或者他们经过努力失败了，那么人类的前途是黯淡的。”很显然他受到了雅斯贝尔斯的影响，因为在他分析为什么中国文明有可能继承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就是他认为当时所有的其他文明都被现代化所异化了，他们都离西方文明太近了，而在他当时看来离文明的源头最近的是中华文明。当然也许他今天要失望了，我说汤恩比要失望，并不仅仅是说中国文明也被现代化异化了，我的看法是人类已经不可能靠回到轴心文明时代去获取力量来回应今天的挑战了。

为什么不能回到文明的源头吸取力量？

为什么不可能？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似乎再一次提出了现代性的不可欲！因为现代价值理念的第一大观念支柱就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从思想史来看，这两大类冲突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大类的冲突恰恰是同一个根源。我们时代的危机，植根在现代性之中，植根在现代性的四大观念（工具理性、个人权利、民族国家、契约社会）之首的“工具理性”之中。

前面说的人和自然的冲突，正是源于“工具理性”扩张的成功。“工具理性”的普遍确立，使市场经济和科技力量无限扩张，终于面临增长的极限。前面说的人类自身（观念）的冲突，又恰恰是源于“工具理性”扩张的失败，也就是说当工具理性扩大到其他文明形态中，最后在伊斯兰文明面前，遇到最顽强的抵抗。

但这只是外在的一面。“工具理性”确立和扩张内在的一方面，是人的终极关怀退到私人领域，人的超越视野弱化乃至丧失。“工具理性”在公共领域成为普遍规则，基于不同文明、不同终极关怀的人们可以建立统一的全球化的现代社会，并使科技和经济不受意识形态遏制无限发展。但这个席卷全球的现代化、全球化，却面临着人一旦在终极关怀上弱化了、在超越视野上丧失了，那么人追求应然社会的动力就大大衰

退甚至消失。所以，这内在的一面，使今天的人在整体上失去了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复活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最根本的挑战，是我们可能正面临着 2500 年来首次将要走出轴心文明的光圈。

没有退路，我们展望新轴心时代

最早看到这个危机的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他在 100 年前已看到“工具理性”走向大分离，现代性将成为一个“铁笼”，人在里面将失去生命的最终意义，只有科技和生产无限扩张。我们今天走在一个陡峭的山崖上，一边是只有工具没有价值的空虚感，只有物欲和物欲的交换、势力和势力的追逐，满足不了一个漂泊的灵魂对于安宁的需求。而探头于另一方向，则是极端思潮、集权思想重新泛滥，各种各样以原教旨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极端思想，以拯救的名义，吞噬着年轻的生命。

现代性起源于加尔文教的改革，思想史上称为现代性的神学起源，但是它的全球扩展却是通过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在座有很多法国朋友，近三百年来，法兰西奉献的欧洲启蒙的理性之火、自由平等博爱的大革命之火、“剥夺剥夺者”的巴黎公社之火，这一盏一盏光耀无比的思想与行动的灯火，让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的思想者和行动者为之神往，乃至为之疯狂！然而我们和全世界所有在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寒风中，用启蒙运动之火来暖身的人一样，都被它灼伤了。但是我们依然要带着我们温暖的记忆和累累伤痕往前走，这就使中国思想界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特别钟情于展望新轴心时代。

汤一介先生是在中国最早提出新轴心时代概念的中国学者。他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总序》中提出，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发展将有三大特点：一是世界文化不再是各自独立发展，而是互相影响下多元共存；二是跨文化和跨学科的对话整合，将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三是不会再由独来独往的大思想家主导，将由众多的思想群体来导演未来文化的发展。新轴心时代要满足什么条件呢？金观涛先生则进一步论述了以现代科学理性取代工具理性后，历史上被工具理性创造出来的现代性观念系统的重建，乃至新轴心时代的社会结构设想。

文明对话的五项前提性原则

不管我们如何猜想新轴心时代，今天可以看见的通向未来之路是不同文明的对话。什么是对话？对话包含了表达，也包含了表达过程中的互相沟通，但是对话有自

己的起点和方向感。

《全球对话时代》的作者维德勒（Leonard Swidler）认为，文化和信仰领域的对话，“不单单只是一系列的会谈，而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一种领会和反映世界以及意义的方法”。他的定义：“对话是两个或更多的持有不同见解的人之间，以通过各自的参与向其他人学习以使其自己能够有所改变和提高为目的的交谈。”这在内涵上规定了对话的起点是承认对方的合理存在，方向上认可自己是可以向对方学习和吸取的。所以说对话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它是新轴心时代建设者的首要心态。

对话有“五戒”，或叫“五项前提性原则”：

一戒缺席（相关方到场原则）：不同是对话的前提，没有不同的相关方到场就无法开展对话。虽然这是基本常识，但也很容易犯这种常识性错误，声称对话却只是一方自说自话。

二戒霸权（平等原则）：对话过程是一个平等的叙述和发现的过程，没有平等的心态就没有真正的对话。

三戒沉默（充分表达原则）：对话是要互相倾听的，充分表达既是对自己权益和观念的声明，也是对他方的尊重。除非是在被强迫到场的特殊情况下，以沉默表示抗议，否则参加对话而不表达，岂非怪事？

四戒固执（可妥协和学习原则）：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也愿意学习并可以妥协和修正自己的看法，这种开放的态度是对话的真精神。

五戒猜忌（信任原则）：应该相信对方，而不是一味猜忌，没有信任，任何对话都不会有积极的成果。

轴心文明的精神依然是我们开创新轴心时代的思想资源

我们在整体上已经不可能复活轴心时代精神来回应挑战，但是轴心文明时代所创造的各种精神源泉，依然可以启迪我们和支撑我们。比如刚才我们讲到对话的五项前提性原则，我们在它背后还是可以看到支撑和引领它们的观念。比如，我们通过“和而不同”的理念看对话，至少可以看到它背后三个层面的东西，一个是它确认了“不同”是世界和事物的本性，世界就是在不同中生成的，要理解不同；第二，“和”是“不同”共存以后创造的新局面，“和”不是简单的不同的东西共同存在，而是不同的东西融合创新的新物体；第三，“内和”才能“外和”，所以“和”的出发点是指向自身的。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入新轴心时代呢？新轴心时代不是一个建构性的社会蓝图，新轴心时代是自然生长的思想创造过程，所以也可以说我们今天正在开始迈向新轴心时代，也许第四个千年来临的时候，那时候的人们会说，21世纪到23世纪之间人类社会进入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文明的光芒照亮了此后的一千年！

我们可以为这个“也许”而理解我们今天时代的所有困难、焦虑、不安和痛苦。

（2015年4月19日“跨文化研究方法论——理解我们时代的思想与行动”国际研讨会发言提要）